

马克思的人道观与共产主义科学信仰

徐健全

前一个时期，在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甚至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最高的人道主义；另外一些人虽然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但在论述问题时又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化。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企图用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而导致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同志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的理解，把马克思的人道观抽象化、片面化。我们反对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赞成对马克思的人道观作抽象、片面的理解，因为后者同样是不科学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人道观，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人道观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与共产主义学说的关系。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科学信仰的重大是非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一)

首先，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不存在马克思的人道观？我们认为，从马克思的整个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看，对于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如果说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等观点和理论构成人道观的话，那么马克思的人道观是存在的。西方资产阶级宣扬马克思学说中没有人的地位，说

共产主义不讲人道，这是毫无根据的。但是，马克思的人道观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而是以人们的物质社会关系为出发点，来提出和回答关于人的一系列问题的。因此，它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提出的对待人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因而是科学的人道观。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早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他就对人的本质问题作出了最初的研究。在1843年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现实活动来研究人的本质，他说“特殊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并且批判黑格尔离开人的现实活动对人的本质作抽象理解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同上第292页）另一方面，他又说，“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同上第293页），这又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带有唯心主义的思辨色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规定是生产劳动。他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认自己是类的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50—51页）但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却把这一切颠倒，人的活动不

是自由自觉的，而是被迫的，不是表现自己的本质，而是丧失自己的本质。因此，必须通过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来消灭异化劳动，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同上第73页）很明显，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仍带有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是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不过，马克思这时不仅从阶级对立出发来研究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而且开始寻求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并主张通过共产主义的行动来消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实现解放人类的目的。

1845年底至1846年初，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标志。在此后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彻底的转变，这就是，马克思不再用“人本主义”“类存在物”等不科学的用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那些空洞、抽象的人道主义议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为什么从这时起马克思要开始批判人道主义的抽象议论呢？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在此以前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但由于还处在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往往借助于旧哲学术语，如类、人的本质等等，这样就招来了麻烦，“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现在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科学体系，一方面为了表示同旧哲学决裂，另一方面为了不使别人钻空子，于是毅然抛弃了那些不科学的说法，批判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其二，在此以前，马克思虽然一直寻找人类解放的途径，但由于深受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这就难免使马克思陷入如象人的本质复归、类存在物、人本主义等抽象的议论之中，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现实道路，自然要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当马克思以科学的革命理论来考察人类解放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却象瘟疫一样泛滥起来，他们企图以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严重损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这就迫使马克思不得不站出来，用科学的革命理论予以回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批判：

首先，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者用抽象的人、人的本质来说明历史发展，把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变革说成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对历史科学的歪曲，是“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而“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同上第77页）因此，人道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绝对不相容的。

其次，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企图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取代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在他们看来，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的最高统一”（同上第550-551页）马克思驳斥说，“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古代——朴素思想，中世纪——浪漫主义，新世纪——人道主义。”（同上第551页）这种人道主义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反动，它同科学共产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

再次，人道主义者用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鼓吹阶级调和，否认阶级对抗的

必然性，涣散无产阶级斗志。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同上第4卷第157页）而那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也附和资产阶级的腔调，“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同上第501页）。而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败坏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最后，人道主义者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看不到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而把虚构的人的本质作为历史的尺度，这也是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不相容的。这一点在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那里最为明显，在他们看来，“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于是，“‘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同上第3卷第576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要由社会历史关系来说明，而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变革又只能从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得到科学说明。

这里，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人道主义抽象宣传的批判，并不是笼统反对任何意义的人道主义，也不是一概否定他自己以往的人道观。马克思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说明历史，同时，他也清算了自己过去的一些人道观点，抛弃了早期某些不科学的说法，努力使自己的人道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对自己以往的合理观点，如人的自由自主活动、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等思想，马克思是一直坚持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称之为人的那些理想，只有在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只有在这个阶段上，人的“自主活动才能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同上第516页）。但是，“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和‘社会天才的发明才干所创造的那个社会机构’相适应，而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同上第442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践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同上第4卷第468-469页）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自己的统治，废除一切剥削制度，消灭阶级，从而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同上第491页）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些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学说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的，马克思的人道观是存在的，而且唯有这种人道观才是历史上科学的人道观。但是，马克思的人道观是怎样获得它的科学性的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二）

马克思的人道观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人道观，就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归宿。因此，要说明马克思的

人道观的科学性，不能仅从马克思关于人性、人的本质或人的解放等个别言论出发，而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发，把它放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说明。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人道思想是贯穿在他全部学说中的一部分。要说明这一部分，当然只有联系他的思想体系，特别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来进行考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有一个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阶段。从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底写成《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这时马克思处在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开始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同年，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开始探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初步提出了废除私有制，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思想，并且开始意识到武器批判的必要和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要。马克思指出，德国实际解放的可能，“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揭露了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并指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单行本第60页）这就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趋势。由此出发，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初步论述。首先，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同上第73页）其次，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现实基础，“整个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亦即在经济中，既为自己

找到经验的基础，也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基础。”（同上第74页）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为了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同上第93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产生才能做到，无产阶级“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经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神圣家族》单行本第45页）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

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时还处在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初步的论述。但是，第一，他虽然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怎样废除私有财产，通过什么途径废除，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怎么走，无产阶级应该按照什么步骤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回答；第二，马克思虽然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理论依据何在，它又是怎样表现出来？马克思也没具体回答；第三，马克思虽然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其经济的基础，即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但还没有科学地揭示出资本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真实关系，也就是说还没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第四，马克思虽然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但是怎样完成、通过什么形式完成这一行动，现实条件是什么？这些都还未作出具体论述。总之，马克思这时虽然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思想，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没最终形成；虽然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初步论述，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因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还不够成熟。这也正是他借用费尔巴哈的许多术语来表述自己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作为马克思人道观的科学基础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在早期还不够成熟，因此马克思早期的人道观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科学的人道观。要完成这一人道观上的革命变革必须以历史观的革命变革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成熟为前提。而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才完成的。

1845年以后，马克思（包括与恩格斯合作）写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首先，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他通过详细地分析生产、分工、交换、分配与所有制的关系，得出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结论。其次，马克思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出发点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指出，“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这就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出发，马克思还揭示了社会革命的内在原因，“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同上第83页）正是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无产阶级的觉悟是革命的物质基础和主观条件，当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生产力成为破坏的力量并且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中产生了必须革命的

共产主义意识的时候，革命就会到来；革命的对象是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消灭阶级统治以及无产阶级本身，最后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只有经过革命才能争得自己的统治，并且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脏东西。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它首先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同上第39-40页）如果还没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足以反抗旧社会的革命阶级，那么，这种革命哪怕在口头上重复千百次也毫无用处。正因为如此，完成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同上第76页）只有在这个阶段上，人的自主活动才能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受局限的个人才向完整的个人发展，人的才能、智慧才可能得到全面发挥，并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此后，马克思又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然趋势及其具体步骤。马克思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就要运用自己的统治，夺取全部资本，集中一切生产工具，“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此外，无产阶级在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

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同上第491页），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有个人和整个社会一切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它所无法克服的重重矛盾，这就进一步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具体分析有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问题，论述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了。

综上所述，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共产主义成为科学一样，马克思的人道观只有在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创立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科学的。

第一，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对人的本质规定、人的历史发展作出科学说明。马克思的人道观无疑要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变化等问题，但是，人的本质不能仅从它自身来说明。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活动的，因此社会关系规定着人的本质；而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是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又说，每个人和每一代人当作现存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才是“‘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由此可见，人的本质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它倒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第二，只有从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出发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的人道观固然关心人的解放，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遭遇给予深刻的同情，愤怒谴责剥削制度的罪恶，揭露它的非人性。但是，人类的解放不是一句空话，只从道义上对剥削制度进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的人道观之所以具有科学

性，就在于它以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为基础，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来达到解放全人类也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一目的。因此离开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革命空谈人的解放，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正如恩格斯所说，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第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价值、尊严、幸福、自由、平等才能得到真正实现。马克思的人道观固然尊重人的价值、尊严，提倡人的自由、平等，但是这一切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以什么作保证，这却不能仅靠空喊几句人道口号来解决，只有依据科学共产主义原理通过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解决。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旧世界、废除私有制，从被剥削、准压迫的奴役境地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建立公有制，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这样，人的价值、尊严才有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幸福才有基础。

第四，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可能实现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从而使人们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马克思的人道观承认，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特性，因为只有这种活动才能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切在以往都受到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等）的限制。历史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公有制建立后才能实现。那时，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三大差别不复存在，社会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们不仅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成为自然的主人，只有在那时，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成为现实。

总之，我们承认有马克思的人道观，但

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孤立地进行，如果抽掉了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人道观就会丧失它的科学性，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三)

在论述马克思的人道观与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时，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科学信仰。有的人离开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抽象地讲什么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继而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最高的人道主义。这种提法在理论上很不科学，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它势必导致某些人用人道主义歪曲和代替共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学说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理论水平，动摇我们的科学信仰。如上所述，马克思的人道观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在于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属于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它既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更不能成为我们的科学信仰。我们的科学信仰只能有一个，这就是共产主义。

为什么说马克思的人道观和共产主义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我们的科学信仰又只能是共产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坚持共产主义也就坚持了马克思的人道观。相反，马克思的人道观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也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其它学说，而它本身却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如果用马克思的人道观来解释或概括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的人道观作为我们的科学信仰，这无疑是以偏概全，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

第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

奥秘的科学理论，它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最优秀的成果，全面考察了以往人类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从而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运用这种理论也就能对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科学的说明，是我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马克思的人道观则不然，从这种观点出发，既不能科学地阐明社会历史现象，更不可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自身具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第三，共产主义不只是一种科学理论，更主要的，它还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在于正确地解释世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人类社会的理想，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现实的革命运动，运用物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最终解放全人类。马克思的人道观则不然，它之所以能够说明和克服社会上某些不人道的现象，就在于它依据共产主义理论，并从属于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的人道观才可能找到归宿。

第四，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是马克思主义同历史上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流派最后分野，而人道观则不然。固然，马克思的人道观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区别，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根本分歧点。况且，人道主义曾经是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容易被别人所利用，以混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因此，我们虽然坚持马克思的人道观，但我们高举的旗帜却只能是共产主义。

最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武器，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真理。中国人民从黑

暗走到光明，从贫困走到初步富强，依靠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样，我们今天也只有在这个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大力发展生产，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过分强调那些空洞的人道口号无助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任何一个实际问题。

这样说，是不是又把马克思的人道观与共产主义学说对立起来了呢？从上述分析中，得不出这个结论来。相反，我们恰恰是想要科学地说明马克思的人道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它和唯物史观特别是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我们并不是说不可以和不需要研究马克思的人道观，而是不同意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把人道观摆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以至把

整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不仅马克思的人道观应该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加以探讨，就是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应当进行分析和鉴别，一概简单地否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坚定共产主义科学信仰的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人道观，并且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人道观的继承和发展，它同样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我们要通过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赵尔丰授建昌道应为何年？

万 华

赵尔丰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授永宁道，不久授建昌道。他任建昌道期间，实行改土归流，发展农、工、交通、教育，对开发边疆起了进步作用。关于赵尔丰授建昌道时间，清史馆最早的一篇赵尔丰传稿，由马其昶主持纂辑，其载曰：“三十一年春，驻藏大臣凤金被害于巴塘，锡良以尔丰补建昌道”。民国十六年清史馆校改的《清史稿》关内本、1977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清史稿》关外二次本、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和《辞海》历史分册（近代史）均取此说。看来，赵尔丰于光绪三十一年春授建昌道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还值得商榷。

傅华封曾随赵尔丰经略川边，为其掌典机要。他在《西康建省记》中《边务大臣办事记》内讲：“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春，驻藏帮办大臣凤金被番人戕害，四川总督锡良奏派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骥往征。”董汉苍所著《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其卷首冠有“赵尔丰之

列传”，其中叙曰：“三十年，调署建昌分巡，兵备道。适巴塘土司作乱，杀驻藏大臣凤金，以尔丰为炉边养后督办，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骥率兵出关，分途往剿”。此外出直接授赵尔丰建昌道的四川总督锡良的言谈记录，当为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锡良遗稿》奏稿五中第一次提到赵尔丰任建昌道是在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锡良，《边职就歼请旨保奖出力各员摺》中说：“其督办尤为在力之二品衔，调署永宁道、建昌道赵尔丰，拟请赏加头品顶戴”。两天后，锡良在《派川汉铁路公司督办摺》中事说：“查有建昌道赵尔丰，志趣坚卓，识断宏毅，遇又以趋避为耻，规求久远，不辞艰苦”，可见赵尔丰任永宁道期间已经兼任建昌道了。

至于赵尔丰授建昌道的最早时间，据锡良于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六日《荐举道员贺元彬请用摺》奏举贺元彬署理建昌道，可证明在此之前赵尔丰尚未授建昌道。

据上面材料可推断，赵尔丰授建昌道是在光绪三十年四月至九月之间，而非光绪三十一年春。